《学术界》(月刊)
总第204期,2015.5
ACADEMICS
No.5 May. 2015

劳动力转移、土地租赁对农户生产收入的影响述评

○ 杜　鑫, 杜志雄
(中国社会科学院　农村发展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开始了波澜壮阔的生产要素资源再配置和调整过程。国内外现有文献比较广泛地研究了中国农户劳动力转移、土地租赁决策的影响因素及其经济影响。但是,国内关于农户模型的理论与经验研究还比较缺乏,已有文献大都没有同时考虑农户多种生产要素配置行为之间的相互关联及其对农户生产收入的综合影响效果,劳动力转移、土地租赁行为对农户农业生产率、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状况的影响效果的研究仍显不足,这些都是下一步研究所应重点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劳动力转移;土地租赁;农户;研究述评

一、引　言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长期面临的一个根本性问题,而实现劳动、土地等生产要素资源的优化配置,是促进农业和农村发展、提高农民收入的关键所在,对于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的实施,农户获得了农村集体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并拥有了独立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从而能够响应市场需求,自主决定要素资源的配置,以实现其收入及效用最大化的目标。以此为起点,中国农村开始了波澜壮阔的生产要素资源再配置和调整过程。首先,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规模不断扩大,流动范围日益宽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数据,201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6894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6610万人,本地农民工10284万人,分别占全部

作者简介:杜鑫(1975—),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发展经济学;杜志雄(1963—),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教授、博导,研究方向:农业经济学。

农民工的 61.8% 和 38.2%；在外出农民工中，举家外出农民工 3525 万人，占到全部农民工的 13.1%。[2] 其次，农村土地流转市场不断发展，农户参与土地租赁市场的规模逐渐增加。根据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辽宁、江苏、甘肃等十省区 1000 个农户跟踪调查数据，2003 年样本农户中参与土地租赁市场的比例为 17.70%，到 2009 年进一步提高到了 25.30%。[3]

如此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与土地租赁对于农民生产和收入会产生什么影响？农村生产要素资源的再配置和调整过程对于中国农业生产和粮食供应会产生什么影响？回答上述问题，可以深入剖析要素市场参与行为对农户农业生产和家庭收入的影响机制，为中国在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过程中提高农业产量、保障粮食供应和增加农民收入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于中国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发展与农户参与要素市场的问题，国内外学者已经进行了较多的研究，上述问题有些已经得到了部分的回答，有些则还需要学术界继续开展研究探索。本文尝试对这些已有的研究文献进行一个综述，在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回顾和学习的基础之上，指出该研究领域依然存在的一些不足以及下一步的改进方向。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首先，介绍关于农户经济行为的基本理论——农户模型。其次，对中国农村住户要素市场参与行为及其影响的研究文献进行综述。由于中国农户是在改革之后才获得家庭生产经营决策权和农业剩余索取权，所以，这些研究基本上都是以改革开放之后为考察时点。根据研究主题的不同，这些研究主要分为农村劳动力市场与土地租赁市场两大类。最后，对已有的研究文献进行简要的总结，并指出其不足之处以及下一步的研究工作所要努力的方向。

二、农户经济行为的基本理论框架——农户模型

关于欠发达地区农户经济行为的主要理论是所谓的农户模型或农业家庭模型（the Agricultural Household Model，AHM）。农户模型认为，农户是一个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的统一体，在给定的家庭偏好、资源禀赋和市场条件下，农户同时做出生产决策（包括产出水平、要素需求、技术选择）、消费决策和劳动力供给决策，以实现效用最大化目标。[4] 一般认为，20 世纪 20 年代苏联经济学家恰亚诺夫（A. Chayanov）所做的关于劳动力市场缺失条件下小农经济行为的分析是农户模型的最早代表，在此之后，许多经济学家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下对各种假设条件下的农户经济行为进行了理论分析，使得这一理论逐渐完善。完全市场条件下的农户理论模型表明，农户的效用最大化问题是递归性的（Recursive），可以分为一个生产部分（要素资源配置到生产中实现利润最大化）与一个消费部分（农户总收入在市场产品和非市场产品之间进行分配实现效用最大化）；由此，农户的生产决策就成为一个简单的利润最大化问题，而与农户的偏好和禀赋无关，农户的消费决策即是在由其资源禀赋量所决定的既定收入水平下的效用最大化问题，而与其要素资源配置方式无关，这即是所谓的完全市场环

境中农户模型的“可分性”特征。但在农村地区劳动、土地、保险、金融等市场存在多重不完全性时,上述可分性特征便不复存在,农户的生产决策会受其偏好与禀赋的影响,从而出现不同农户之间单位土地上的劳动投入和产出水平不同、农地耕种规模与土地生产力负相关等现象。国外许多学者对亚洲、非洲、拉美地区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地区普遍存在着各种市场不完全性,由此导致农户的生产决策与其偏好和禀赋紧密相关。[5] 由于农户模型将同时从事生活和消费活动的经济人予以模型化,能够综合考虑生产要素需求、技术选择、产出水平、消费需求、劳动力供给决策、要素及财富禀赋、可交易产品价格等因素之间的复杂影响,从而成为了一个有力的农户经济行为分析工具。

国外学者在早期主要是运用农户模型来研究农产品价格政策对农业产出的影响等农业发展政策问题,[6] 后来逐渐扩展到了许多研究主题,如 Huffman 运用农户模型来检验美国农民的非农劳动力供给、生产和消费决定,[7] Strauss 使用农户模型考察了农户的家庭食物消费和卡路里吸收量的决定因素,[8] Barnum and Squire 利用农户模型估计移民的机会成本,[9] Lau 等人研究了政府收入分配、提高工资和资产转移等政策对不同家庭的生产、要素投入、劳动供给和消费支出的影响,[10] Taylor 则利用农户模型考察了劳动力迁移问题,并提出了不完全市场条件下农户劳动力迁移的新经济学理论。[11] 总的来看,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应用上,农户模型已经逐渐成为对小型农业经济开展微观研究的主要理论分析框架。[12]

三、农户劳动力转移就业及其影响

由于城乡分割制度、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和政府对农户农业生产配额的限制等一系列原因,中国农村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首先是从劳动力市场开始起步的,农村劳动力经历了从农业转向本地非农就业、再流向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的资源再配置过程,[13] 国内外学者形成了大量关于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配置及转移就业(或非农就业)问题的研究。

Gregory and Meng 发现,在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早期,本地非农就业劳动力在农村工业部门的就业仍然存在显著的非市场化配置特征。[14] Lin 首先研究了要素禀赋、水稻种植技术、要素市场报酬等因素对农户参与农业劳动力市场的影响,[15] 更多的文献则研究了个体人口特征、人力资本、土地禀赋、资产状况、收入水平、城乡收入差距、社会网络等因素对中国农村劳动力对多种就业方式(包括农业就业、本地非农就业、迁移就业等)参与决策的影响。[16] 上述研究发现,农户劳动力与土地资源禀赋、资产状况、社会网络等变量对农户劳动力资源配置及转移就业决策具有显著影响,从而证实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农户相似,中国农户也处在一个不完善的市场环境之中,面临着多重的劳动、土地、信贷市场约束。较多的文献研究发现,劳动力转移就业对农户参与土地租赁市场的决策行为产生了显著影响,有利于促进农户租出土地,而对农户租入土

地的概率产生了负向影响。[17]有的文献考察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对农户生产性资产或投资的影响,大都发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对农户生产性资产或投资并没有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18]有些文献考察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对农户农业生产率和农业收入的影响,Rozelle 和 Taylor 等人估计了劳动力迁移及其汇款对农户土地生产率和家庭经营收入的影响,发现劳动力迁移所带来的劳动力流失效应对农户农业生产及家庭经营收入带来了较大的不利影响,同时,这种不利影响仅能由迁移汇款部分地予以补偿,[19]王子成利用较新的 2005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所进行的研究也再一次得出了基本相同的结论。[20]有许多文献研究发现,劳动力转移就业显著提高了农户家庭收入水平,[21]Zhao 还发现,不同就业类型对农户家庭收入的贡献大小依次是:劳动力迁移就业高于本地非农就业,本地非农就业又高于农业就业;[22]但是,关于劳动力转移就业对农村居民收入分配会产生何种影响,已有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有的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扩大了农村居民收入差距,[23]有的则得出了相反的结论,[24]研究结论的差异可能是由研究方法、抽样范围差异以及不同样本所处的转移就业发展阶段不同等多种原因造成的。[25]有的文献研究了劳动力转移就业对农户消费的影响,发现由于中国农村家庭将迁移收入看作暂时性收入而非持久性收入,导致迁移收入对农村家庭消费的影响程度非常小,而就地转移收入对提高农村家庭消费的贡献要高于迁移收入。[26]

四、农村土地租赁行为及其影响

中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农村土地承包法》决定了农户不享有土地所有权而仅享有承包经营权、流转(租赁或转包)权等土地权利,关于农村土地市场的研究集中在土地流转或租赁市场的发展问题上。

随着改革后农村非农产业与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市地区转移的规模不断扩大,进而促发了农村土地流转或租赁市场的发展。目前,已有较多的文献研究了农户要素禀赋、农业生产技术、家庭人口特征、人力资本、劳动力转移就业状况(或本地劳动力市场发育状况)、要素市场报酬水平、制度或交易成本等变量对农户参与土地租赁市场行为的影响,其中,有的研究了农户租入土地决策行为的影响因素,[27]有的还研究了农户租出土地及不参与土地租赁市场决策行为的影响因素;[28]有的以农户是否参与土地租赁市场的决策行为作为因变量,[29]有的则以农户土地租赁数量为因变量。[30]这些研究结果大都表明,在面临多重市场不完全性时,农户所拥有的土地、劳动等要素资源禀赋、劳动力转移就业状况、制度或交易成本等因素对农户是否参与土地租赁市场交易及其租赁数量均具有显著的影响。有的文献考察了中国农村土地行政性再分配与土地租赁市场交易之间的关系,发现这两种土地调整方式之间具有一定的代替性,[31]金松青、Klaus Deininger 则对这两种土地调整方式的公平性、效率性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两者都会使得土地流向土地禀赋较少、农业生产能力较强

的农户,从而有助于促进公平和效率,但市场化的土地租赁市场交易的作用效果要显著优于行政性再分配。[32]一些文献研究了不同程度的土地租赁权利对农户农业投资和农业生产率的影响,发现较为自由的土地租赁权利更有利于农户增加农业投资,提高农业生产率,[33]Feng 等人发现农户的租入土地行为有利于提高农户水稻生产的技术效率和水稻亩产量,[34]陈训波等人则比较了土地转出户、转入户、无流转户三者之间生产率差异,发现土地转出户的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最低,无流转户次之,转入户最高,但三类农户土地生产率的高低次序则正好相反。[35]此外,李庆海等人还考察了土地租赁交易行为对农户福利水平的影响,发现无论是土地租入还是租出,都有利于提高农户收入水平和可支配金融资产余额,土地租出行为还显著提高了农户的消费水平,土地租入和土地租出两者相比较,土地租出行为对改善农户福利水平的影响效果更大。[36]

五、评论与展望

(一)已有研究总结

1. 研究内容。农户模型已成为对小型农业经济开展微观研究的主要理论分析框架,也为研究中国农户的生产要素配置方式及其影响效果提供了基本的分析框架。中国农村地区存在显著的市场不完全性,在此环境中,中国农户的生产要素配置及要素市场参与决策必然要受到自身资源禀赋的影响,各种生产要素配置及要素市场参与方式之间必然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农户生产要素配置及要素市场参与方式必然会对农户的生产、收入水平进而对其消费决策产生显著的影响。国内外已有较多数量的关于中国农户参与劳动力、土地两大要素市场的经验研究,在研究内容上比较广泛,包括了农户劳动力转移与土地租赁决策的影响因素、劳动力转移与土地租赁行为对农业投资和农业生产的影响、对家庭收入及消费的影响等多个方面,其研究结论也基本证实了中国农村地区存在着多重市场不完全性的假设,农户关于劳动力与土地要素的配置方式深受其资源禀赋的影响,而农户关于劳动力与土地要素的配置方式又会进一步影响其生产、收入水平及消费决策。

2. 研究方法及数据。在关于中国农户的经验研究中,有的使用的是 20 世纪 80、90 年代的调查数据,有的也使用了近年来较新的调查数据;抽样范围既包括范围较小的几个县几个村,有的也横跨了多个省份。由于调查成本所限,已有的研究所使用的大都是横截面数据,由于大多数横截面数据存在未观测个体信息缺失所导致的遗漏变量问题,这些经验研究大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解释变量内生性问题。针对此问题,现有的经验研究基本都是使用工具变量法来予以解决,但在实际应用中,工具变量的有效性难以保证。相比之下,一些研究使用面板数据所做的研究可以较好地解决横截面数据所存在的上述问题。[37]已有的研究文献根据研究内容和样本数据的不同,使用了多种经济计量分析方法。具体来说,关于农户劳动力转移、土地租赁参与决策的研究大都使用了 Probit、Logit、双变量

Probit、多项 Logit 等概率选择模型,关于农户劳动力转移、土地租赁数量决策的研究则使用了 Tobit 模型;关于农户劳动力转移、土地租赁行为对其投资、生产、收入及消费的影响的研究则使用了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Heckman 选择性偏差纠正模型、多重内生处理效应模型等。

总的来看,已有的研究文献使用多种限值因变量模型和线性回归模型,比较广泛地研究了农户劳动力转移、土地租赁决策的影响因素及其对农户投资、生产与收入水平的影响,有助于深入理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及其经济效果,并为开展下一步的研究工作提供了较好的借鉴和参考。

(二)有待改进的研究方向

尽管关于中国农户劳动力转移与土地租赁行为的研究已经取得了比较丰富的成果,但这一主题的研究仍然存在一些有待改进的方面:

1. 国内关于农户模型的理论与经验研究比较缺乏。从前文可知,国外关于农户模型的理论与经验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与此相反的是,国内关于农户模型的理论与经验研究——包括在农户模型的理论框架下研究中国农户对劳动力、土地及其他生产要素的配置问题——依然是比较缺乏的。尽管一些关于中国农户生产要素配置行为的研究文献也得出了与农户模型的理论预期相一致的研究结论,如处于不完全市场环境中的中国农户的生产要素禀赋对其要素配置方式具有显著影响,农户生产要素配置方式对其生产、收入水平及消费决策具有显著影响,但已有的这些研究由于缺乏农户模型的理论框架,从而不能在深刻理解农户行为特征的基础上来研究农户的经济决策机制,导致理论建模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不能对农户多种生产要素配置的生产决策以及生产决策与消费决策的整体性进行分析;经验分析缺乏应有的力度和深度,不能从市场环境和制度约束中寻找估计结果的产生原因。此外,基于农户模型的理论框架,还可以考察更为广泛的研究主题,如生产要素市场环境、农户生产要素配置决策、农业生产种植结构与技术选择之间的关系,政府农业政策对农户生产要素配置、农业产出、家庭收入及消费决策的影响,等等,研究上述问题对于促进当前的中国农业和农村发展来说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2. 已有文献大都没有同时考虑农户多种生产要素配置行为之间的相互关联及其对农户生产收入的综合影响效果。在已有的研究中,有的文献仅研究了劳动力转移就业对农户生产收入的影响,有的文献仅研究了土地租赁对农户生产或收入的影响。农户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决策单位,在不完全的生产要素市场环境中,其各种生产要素配置行为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在考察农户生产要素配置行为对其生产收入的影响时,考虑多种生产要素配置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综合影响,可以得到更为全面和准确的结论;相反,如果仅考虑其中一种生产要素的配置行为,由于该种生产要素配置行为的影响结果可能同时包含(或反映)了与其相关的其他生产要素配置行为的影响,所得出的结论可能是不可靠或不

准确的。例如,李庆海等人利用 2003 – 2009 年中国 10 个省份的农户调查数据研究发现,租出土地对于提高农户收入、消费与金融资产余额的贡献不仅具有较强的统计显著性,而且其贡献数额也要高于租入土地。[38] 在中国农村土地租金水平普遍较低的情况下,此种结论单从土地租赁活动本身难以得到充分解释,一个更为可能的解释就是,农户租出土地这一生产要素配置行为与其另一种生产要素配置行为——劳动力转移就业——紧密相关;由于劳动力转移就业活动通常与农户土地租出行为相联系,并且劳动力转移就业能够带来较高的非农就业收入,从而使农户的土地租出行为"表现"出更高的福利改善效果,即农户土地租出行为的影响效果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包含(或反映)了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影响效果。Feng 等人曾分别孤立地考察了农户劳动力转移就业与土地租入行为对其水稻生产技术效率、化肥投入和土地生产率的影响,但都将农户对两个要素市场的参与行为简单地设定成为两个外生变量,这样就会产生两个问题。[39] 首先,将劳动力转移就业和土地租赁行为简单地作为外生变量处理,就不能深入考察农户对多种要素资源配置的联合决策行为及其相互关系。其次,农户对要素市场的参与行为变量都是由农户经济系统内生决定的变量,不考虑其内生性而简单地将其作为外生变量处理,在研究农户要素市场参与行为对其生产收入的影响效果时,必然会导致内生性偏误。

与以上研究不同,杜鑫基于农户生产要素配置联合决策的分析思路,研究了农户劳动力转移、土地租赁及农业资本投入的联合决策机制,在考虑农户各生产要素配置变量联立性的基础上较好地解决了内生性问题。[40] 但总的来说,国内关于农户多种生产要素配置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对农户生产收入的综合影响的研究依然十分缺乏。

3. 劳动力转移、土地租赁行为对农户农业生产率的影响效果的研究仍显不足。目前,已有较多的文献利用地区水平的宏观加总数据研究了中国农业生产率的变化趋势及其影响因素,[41] 仅有少数文献利用农户水平的调查数据进行了微观研究。[42] 在后者中,只有 Rozelle 等人研究了农户劳动力迁移就业对其玉米亩产量的影响,但在其研究中,土地要素仅作为一个外生变量而存在,没有考虑农户土地要素配置行为的影响,这可能是由于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中国农村地区土地流转市场尚未得到有效的发展;[43] 陈训波等人仅仅是对土地转出户、转入户、无流转户的农业生产率水平差异进行了简单的描述,并没有深入研究土地流转行为对农户农业生产率水平的影响,从而无从得知三类土地流转农户之间的农业生产率差异究竟是土地流转的原因还是土地流转的结果。[44] 因此,国内外学术界还缺乏土地流转或租赁行为如何影响中国农业生产率的研究,关于农户的多种生产要素配置行为如何影响中国农业生产率的研究也是极其不足的。但是,深入研究上述问题,有助于正确理解大规模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和土地流转活动对于中国农业生产的影响效果,对于中国在新形势下稳定农业产量、保障农产品供应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4. 关于农户要素市场参与行为——特别是农户土地租赁——对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效果的研究尚不充分。长期以来,对于土地流转活动可能会扩大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加剧农村社会两极分化的担忧一直是阻碍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与土地市场发育的一个重要原因。目前,已有较多的文献考察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活动对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45]但缺乏农村土地租赁活动对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效果的研究文献,更缺乏同时考察农户参与劳动力市场与土地租赁市场对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效果的研究文献。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无疑可以解答学术研究者和社会各界长期以来对推进中国农村土地市场发展的担忧和疑虑。

5. 关于农户的各种要素市场参与方式如何影响其生产收入的研究尚不完整。已有的文献在研究劳动力转移就业对农户生产、收入水平的影响效果时,大都只考察了其中的一种转移就业形式——迁移就业或异地转移就业,而没有考察另外一种重要的转移就业形式——本地非农就业或就地转移就业。虽有少数文献研究了农村劳动力不同转移就业方式对农户家庭收入水平及其消费、投资支出的影响,[46]但没有考虑农户的土地要素配置行为,而是简单地将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当作一个外生变量引入经济计量模型。然而,就地转移和异地转移这两种不同的转移就业方式,对农户的土地租赁市场参与行为、农业生产、家庭收入及支出决策可能都会产生极不相同的影响。在研究土地租赁活动对农户农业生产的影响效果时,已有文献仅考察了土地租入行为对农户农业生产的影响,却没有考察土地租出行为的影响。[47]然而,全面考察农村土地租赁活动对农业生产的影响,需要同时从土地租入方和土地租出方分别考察农户土地租入行为和土地租出行为的影响,然后才能在此基础上进行综合判断,得出整个农村土地租赁活动对中国农业生产的总体影响效果。

注释:

〔1〕张晓山:《深化农村改革,促进农村发展——三大制约因素、一个基本认识、两类政策措施》,《中国农村经济》2003 年第 1 期。

〔2〕国家统计局:《2013 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405/t20140512_551585.html。

〔3〕〔36〕〔38〕李庆海、李锐、王兆华:《农户土地租赁行为及其福利效果》,《经济学(季刊)》2011 年第 11 卷第 1 期。

〔4〕Singh, I., L. Squire and J. Strauss, Agricultural Household Models: Extensions, Applications and Policy,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6.

〔5〕巴德汉、尤迪:《发展微观经济学》,陶然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年。

〔6〕参见 Kuroda, Y. and P. Yotopoulos, A Microeconomic Analysis of Production Behavior of the Farm Household in Japan: A Profit Function Approach, The Economic Review, Vol. 29, No. 2, 1978; Ahn, C. Y., I. J. Singh and L. Squire, A Model of An Agricultural Household in a Multi - crop Economy: The Case of Korea,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 63, No. 4, 1981.

〔7〕参见 Huffman, W. E., Farm and Off - farm Work Decisions: The Role of Human Capital, Review of Eco-

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 62, No. 1, 1980; Huffman, W. E., Human Capital: Education and Agriculture, in Bruce L. Gardner and Gordon C. Rausser(eds.), Handbook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Vol. IA, Elsevier Science/North - Holland, 2001, pp. 333 - 381.

〔8〕Strauss, J., Joint Determination of Food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 in Rural Sierra Leone: Estimates of a Household - firm Model,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14, No. 1, 1984.

〔9〕Barnum, H. N. and L. Squire, An Econometric Application of the Theory of Farm Household,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6, No. 1, 1979.

〔10〕Lau, L., P. Yotopoulos, E. C. Chou and W., Lin, The Microeconomics of Distribution: A Simulation of the Farm Economy, 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 Vol. 3, No. 2, 1978.

〔11〕Taylor, J. E., Undocumented Mexico - US Migration and the Returns to Households in Rural Mexico,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Vol. 69, No. 3, 1987.

〔12〕Taylor, J. E. and I. Adelman, Agricultural Household Models: Genesis, Evolution and Extentions, Review of Economics of the Household, Vol. 1, No. 1 - 2, 2003.

〔13〕蔡昉:《中国劳动力市场发育与就业变化》,《经济研究》2007 年第 7 期。

〔14〕Gregory, R. G., X. Meng, Wage Determination and Occupational Attainment in the Rural Industrial Sector of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Vol. 21, No. 3, 1996.

〔15〕Lin, J. L., Endowments, Technology, and Factor Markets: A Natural Experiment of Induce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from China's Rural Reform,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Vol. 77, No. 2, 1995.

〔16〕参见 Zhao, Y., Labor Migration and Earnings Differences: The Case of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 47, No. 4, 1999; Zhao, Y., Leaving the Countryside: Rural - to - Urban Migration Decision in China,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9, No. 2, 1999; Du, Y., A. Park, and S. Wang, Migration and Rural Poverty in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Vol. 33, No. 4, 2005; Shi, X., N. Heerink and F. Qu, Choices between Different Off - farm Employment Sub - categori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for Jiangxi Province.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Vol. 18, No. 4, 2007; Feng, S., and N. Heerink, Are Farm Households' Land Renting and Migration Decisions Inter - related in Rural China?, NJAS - Wageningen Journal of Life Sciences, Vol. 55, No. 4, 2008; 杜鑫:《劳动力转移对中国农村居民经济福利的影响》,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年;杜鑫:《劳动力转移、土地租赁与农业资本投入的联合决策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13 年第 10 期。

〔17〕参见 Kung, J. K., Off - Farm Labor Markets and the Emergence of Land Rental Markets in Rural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Vol. 30, No. 2, 2002; Jin, S. and K. Deininger, Land Rental Markets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Productivity and Equity Impacts from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Vol. 37, No. 4, 2009; Kimura, S., K. Otsuka, T. Sonobe and S. Rozelle, Efficiency of Land Allocation through Tenancy Markets: Evidence from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 59, No. 3, 2011.

〔18〕参见 de Brauw, A. and S. Rozelle, Migration and Household Investment in Rural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Vol. 19, No. 2, 2008; 杜鑫:《劳动力转移对中国农村居民经济福利的影响》,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年。

〔19〕参见 Rozelle, S., J. E. Taylor and A. de Brauw, Migration, Remittances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in China,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9, No. 2, 1999; Taylor, J. E., S. Rozelle and A. de Brauw, Migration and Incomes in Source Communities: A New Economics of Migration Perspective from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 52, No. 1, 2003.

〔20〕王子成:《外出务工、汇款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证据》,《中国农村经济》2012 年第 4 期。

〔21〕参见 Zhao, Y., Labor Migration and Earnings Differences: The Case of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 47, No. 4, 1999; 李实:《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与收入增长和分配》,《中国社会科

学》1999 年第 2 期;朱农:《中国劳动力流动与“三农”问题》,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年;Du, Y. , A. Park, and S. Wang, Migration and Rural Poverty in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Vol. 33, No. 4, 2005;杜鑫:《劳动力转移对中国农村居民经济福利的影响》,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年。

〔22〕Zhao, Y. , Labor Migration and Earnings Differences: The Case of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 47, No. 4, 1999.

〔23〕参见朱玲:《非农产业活动对农户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赵人伟、格里芬:《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年;李实、赵人伟、张平:《中国收入分配变动的理论解释与经验分析》,赵人伟、李实、卡尔·李思勤:《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 年;约翰·奈特、宋丽娜:《中国经济增长、经济改革和收入差距的扩大》,赵人伟、李实、卡尔·李思勤:《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 年。

〔24〕〔45〕具体文献参见朱农:《中国劳动力流动与“三农”问题》,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年;杜鑫:《劳动力转移对中国农村居民经济福利的影响》,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年。

〔25〕杜鑫:《劳动力转移对中国农村居民经济福利的影响》,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年。

〔26〕〔46〕具体文献参见 Zhao, Y. , Leaving the Countryside: Rural - to - Urban Migration Decision in China,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9, No. 2, 1999;杜鑫:《劳动力转移对中国农村居民经济福利的影响》,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年。

〔27〕参见 Kung, J. K. , Off - Farm Labor Markets and the Emergence of Land Rental Markets in Rural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Vol. 30, No. 2, 2002;田传浩、贾生华:《农地制度、地权稳定性与农地使用权市场发育:理论与来自苏浙鲁的经验》,《经济研究》2004 年第 1 期。

〔28〕参见 Lin, J. L. , Endowments, Technology, and Factor Markets: A Natural Experiment of Induce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from China's Rural Reform,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Vol. 77, No. 2, 1995; Jin, S. and K. Deininger, Land Rental Markets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Productivity and Equity Impacts from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Vol. 37, No. 4, 2009; Kimura, S. , K. Otsuka, T. Sonobe and S. Rozelle, Efficiency of Land Allocation through Tenancy Markets: Evidence from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 59, No. 3, 2011;盖庆恩、朱喜、史清华:《劳动力转移对中国农业生产的影响》,《经济学(季刊)》2014 年第 13 卷第 3 期。

〔29〕参见 Lin, J. L. , Endowments, Technology, and Factor Markets: A Natural Experiment of Induce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from China's Rural Reform,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Vol. 77, No. 2, 1995;田传浩、贾生华:《农地制度、地权稳定性与农地使用权市场发育:理论与来自苏浙鲁的经验》,《经济研究》2004 年第 1 期;Jin, S. and K. Deininger, Land Rental Markets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Productivity and Equity Impacts from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Vol. 37, No. 4, 2009;盖庆恩、朱喜、史清华:《劳动力转移对中国农业生产的影响》,《经济学(季刊)》2014 年第 13 卷第 3 期。

〔30〕参见 Kung, J. K. , Off - Farm Labor Markets and the Emergence of Land Rental Markets in Rural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Vol. 30, No. 2, 2002; Kimura, S. , K. Otsuka, T. Sonobe and S. Rozelle, Efficiency of Land Allocation through Tenancy Markets: Evidence from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 59, No. 3, 2011.

〔31〕参见 Brandt, L. , J. Huang, G. Li and S. Rozelle, Land Rights in China: Facts, Fictions, and Issues, The China Journal, Vol. 47, 2002; Zhang, Y. , Wang, X. , Glauben, T. , and B. Brümmer, The Impact of Land Reallocation on Technical Efficiency: Evidence from 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s, Vol. 42, 2011.

〔32〕金松青、Klaus Deininger:《中国农村土地租赁市场的发展及其在土地使用公平性和效率性上的含义》,《经济学(季刊)》2004 年第 3 卷第 4 期。

〔33〕参见 Brandt, L. , J. Huang, G. Li and S. Rozelle, Land Rights in China: Facts, Fictions, and Issues, The China Journal, Vol. 47, 2002;姚洋:《土地、制度和农业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年。

〔34〕〔39〕〔47〕具体文献参见 Feng, S, Land Rental, Off - farm Employment and Technical Efficiency of

Farm Households in Jiangxi Province, China, NJAS – Wageningen Journal of Life Sciences, Vol. 55, No. 4, 2008; Feng, S., N. Heerink, R. Ruben and F. Qu, Land Rental Market, Off – farm Employment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Southeast China: A Plot – Level Case Study, China Economic Review, Vol. 21, 2010.

〔35〕〔44〕陈训波、武康平、贺炎林:《农地流转对农户生产率的影响——基于 DEA 方法的实证分析》,《农业技术经济》2011 年第 8 期。

〔37〕参见金松青、Klaus Deininger:《中国农村土地租赁市场的发展及其在土地使用公平性和效率性上的含义》,《经济学(季刊)》2004 年第 3 卷第 4 期;Jin, S. and K. Deininger, Land Rental Markets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Productivity and Equity Impacts from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Vol. 37, No. 4, 2009;盖庆恩、朱喜、史清华:《劳动力转移对中国农业生产的影响》,《经济学(季刊)》2014 年第 13 卷第 3 期。

〔40〕杜鑫:《劳动力转移、土地租赁与农业资本投入的联合决策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13 年第 10 期。

〔41〕参见 Lin, J. L, Rural Reforms and Agricultural Growth in China,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2, No. 1, 1992; Huang, J. and S. Rozelle, Technological Change: Rediscovering the Engine of Productivity Growth in China's Rural Economy,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49, No. 2, 1996; Mao, W. and W. W. Koo, Productivity Growth,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Efficiency Change in Chinese Agriculture after Rural Economic Reform: A DEA Approach, China Economic Review, Vol. 8, No. 2, 1997; Jin, S., H. Ma, J. Huang, R. Hu and S. Rozelle, Productivity, Efficiency and Technical Change: Measuring the Performance of China's Transforming Agriculture, Journal of Productivity Analysis, Vol. 33, No. 3, 2010.

〔42〕参见 Rozelle, S., J. E. Taylor and A. de Brauw, Migration, Remittances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in China,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9, No. 2, 1999; Carter, C. A., J. Chen and B. Chu.,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Growth in China: Farm Level versus Aggregate Measurement, China Economic Review, Vol. 14, No. 1, 2003;李谷成:《技术效率、技术进步与中国农业生产率增长》,《经济评论》2009 年第 1 期;陈训波、武康平、贺炎林:《农地流转对农户生产率的影响——基于 DEA 方法的实证分析》,《农业技术经济》2011 年第 8 期。

〔43〕Rozelle, S., J. E. Taylor and A. de Brauw, Migration, Remittances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in China,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9, No. 2, 1999.

〔责任编辑:文　谊〕